

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姚 敏

(北京华文学院, 北京 102206)

[关键词] 晚清政府; 华文教育; 语言改革; 官方语言; 侨务政策

[摘要] 论文梳理了从晚清、民国、新中国政府等不同时期中国官方语言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认为晚清政府开启了管理海外华文教育的先河, 使得中国官方语言改革的成果可以通过华文教育更有力地传播到海外。民国时期的国语教育主要是依靠国内语言政策和海外华文教育机构共同实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政府取消了“双重国籍”政策。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主要是由中国国际移民的迁移影响到海外华文教育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 汉语国际声望的提高, 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在此过程中, 民族共同语教育对华侨华人的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图分类号] H195; D6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7)02-0064-07

The Influence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Official Language on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YAO Min

(Beij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Beijing 102206, China)

Key words: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reform; official language; overseas Chinese policies

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fficial language on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t finds out that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opened a precedent for the manag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so that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official language reform could be transmitted more efficiently through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was mainly realized by domestic language policies and oversea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government abolished the "dual nationality" policy.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was influenced by Putonghua, Chinese Pinyin, an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mainly through Chinese international migrants.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prestige, the influence of Putonghua, Chinese Pinyin, an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abroad has been further improved. In this proces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海外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侨华人社会重要的语言教育活动, 是华侨华人自发地传承、学习自己民

[收稿日期] 2017-01-04; [修回日期] 2017-04-19

[作者简介] 姚敏, 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北京华文学院教务处副处长、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华文教育政策、语言规划、语言传播等。

* 本研究受北京华文学院 2014 年度重点项目资助, 项目批准号: HW-14-A01。

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被认为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海外华文教育也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多关注某一地区或作为整体的华文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也有研究关注到了“国语”教学,如,别必亮就专门研究了近代华侨学校的国语教学;^[1]于锦恩等有多篇论文从国语教材分析、国语文教师来源和汉语教育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海外国语教学的情况。这些研究都属于断代史研究,是民国时期海外华文教育的重要研究成果。^[2]

从清中晚期开始,中国的语言文字开始了现代化的变革。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从方言到民族共同语,从发音、词汇、语法、语音标注的规范到汉字简化,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一直朝着“言文一致,简单易学、规范标准”的现代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海外华文教育也几乎同步经历了由方言教学逐步发展到普通话教学的过程。本文试图以时间为纵轴,梳理从晚清中国政府开始对海外华文教育管理至今,不同时期的中国官方语言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分析每一时期的背景、成因及主要推动力量,借以说明民族共同语教育在构建华侨华人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一、晚清:海外华文教育中“官话”的初兴

清朝政府对于海外华侨的态度是随着海内外时局的变化而改变的。清初期和中期,统治者妄自尊大,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对移居海外的国人十分反感,认为中国人出国会通盗为匪,所以明令禁止。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使晚清政府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清政府开放国门,并在海外设立了使领馆。随着对海外华侨的认识逐渐加深,清政府了解到他们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与他们之间的关系。管理海外华文教育是晚清政府开启民智、引导海外华侨民族意识的重要举措之一。而语言就是其最早关注到的问题。

(一)以方言划分的帮群及地方认同

中国人移民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自秦汉到唐宋,由行商到住商。大多数出国华侨是闽、粤和客家人,加上元明逃避战祸的难民,构成了早期华侨的主体。^[3]到了清中晚期,国内连年天灾人祸,边境地区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加上海外一些国家和大公司对劳工的巨大需求,大量沿海地区的中国人移居国外谋生,形成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海外移民的一次高潮。

由于我国沿海地区方言发音差异大,不同方言之间交流困难,讲同一方言的人自然会对自己熟悉的语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再加上地域文化不同,各地生活习惯、风俗习惯差异较大,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因此,明清时期海外华侨社会呈现出各方言群自成一体的状态。华侨在居留地定居下来以后,受到不同方言的限制,慢慢以方言和地方纽带组织起来。组织的方言会馆具有浓厚的方言和地域性色彩。^[4]19世纪初期,新加坡、马来亚等地就成立了不少华侨方言会馆。不同地域的社会习俗和宗教信仰有所不同,有助于培养地域性的认同感,^[5]但却在无形之中使不同籍贯的华侨之间产生了无法沟通的隔阂。

因为方言问题在海外华侨内部引发了不少矛盾与分歧,海外华侨往往界限心过重。广东人和福建人之间互不联络,老死不相往来。不仅如此,在内部还各分团体,比如,福建人又分福州人和漳泉帮,而广东又分为广府、潮州、客家和海南帮。这些方言帮派之间不仅互不往来,甚至还会发生械斗。^[6]例如,1892年,在吧城(今印尼首都雅加达)华侨社区就发生了福建籍与客籍之间,因小孩争执而引起械斗的事件,双方各自派出武术拳师,导致数人死伤。^[7]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也常常被外人诟病。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语言不统一,致使海外华侨之间形成了拉帮结派、各自为政的局面。

(二)民族共同语意识的萌发及官话的推行

晚清政府意识到了语言不通的危害性,在派出专使推动海外华文教育的过程中,多强调国家语言的重要性。以“学务专使”梁庆桂为例,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他受朝廷委托远赴美国推动华文教育。他在劝学声明中提到“教育家有言:凡国于大地必有其国民,使其民具普通之智识,抱钟

爱之热诚，以养成国民资格，而所授教育，必以本国语言文字为主，盖语言文字为立国之要素，一国之人，无远无近，无老无幼，所藉以表情意通声气者，惟语言文字是赖。故灭人国者，必灭其国之语言文字，使失其所以表情意通声气之具扼其吭而制其肘，然后任务奴隶之，牛马之是命。”^[8]在这份劝学声明中，梁庆桂将国家语言文字的作用提升到了立国的高度，指出了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上的重要性。

早期的华文教育形式多为私塾和书院，基本都以方言授课，这限制了华侨的生存发展空间，更不利于华侨后代形成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有鉴于此，晚清政府建立新式华侨学校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侨民子弟肄习祖国语言文字，一炉而冶，养成宏达之才，归备国家之用”。^[9]

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决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从政府的角度明确了“国语”的民族共同语地位。在此之前，晚清政府已经有了民族共同语的意识，提倡在教育中使用当时的官方共同语“官话”进行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清政府公布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教育法令——《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中国民间各操土音，致一省之内彼此不能通渝，办事多扞格。兹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由于晚清海外华文教育属于国民教育的一部分，也以此为纲，所以国内语文运动的成果也能够向海外传播。

除了晚清政府外，当时还有一些流亡在外的维新派人士和革命党人，也积极利用海外华文教育宣传自己的思想。尽管他们的主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意识到，海外华侨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划分省或地区。^[10]加强民族共同语教育，有助于打破海外华侨狭隘的地方主义，形成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认同。

以维新派著名代表人物康有为为例。1903年，他受邀在南洋各地发表演讲时，多次指出“文字之声应用国音，日常言谈应用国语”，^[11]他还亲自担任荷属巴达维亚的八打威中华学校校长，实现普及民族共同语的主张。1905年，该校的章程所制定的课程中，民族共同语的学时最多占到了总学时的43%。^[12]

海外的革命党人也积极参与民族共同语的推广工作，如，新加坡著名文化民族主义领袖林文庆博士认为，语言是形成中国人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也是增进华侨各帮团结的手段。为此，他发起了一场学习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在自己家中开办了第一个为海峡土生华人而设的国语班。^[13]1906年，他还召集各方言组织领袖开会，呼吁他们在学校中推广民族共同语。^[14]

晚清时期，方言组织之间的分裂、对峙和冲突是海外华侨社会的一大弊病。晚清政府提倡用官话进行海外华文教育，就是意识到民族共同语在“国家”认同中的巨大作用。海外知名人士积极参与，也是意识到民族共同语的传播与推广有助于加强海外华侨对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感，有利于消除华侨之间的语言隔阂和封闭的地域宗亲观念，增强华侨之间的凝聚力，促进海外华社的沟通、团结和融合。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清政府的相关措施有些还未落实就戛然而止，此外，海外华侨社会的语言使用也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有所改变。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官方语言在海外的推行还处于意识萌发期，其主要任务是确立民族共同语的地位。外派的政府官员、在海外的维新派人士和革命党人，这三种力量共同参与推动了当时民族共同语的海外推广。

二、民国：海外“国语”教育的大力推行

早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就在海外华社筹办华校，宣传革命理念，故而，民国政府从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海外华文教育的发展，建立了专门的侨务管理机构，并出台了一系列华文教育政策。这些都为海外“国语”教育的推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海外华校方言教育引发关注

民国早期，海外华社仍然各自为政。除了一些新式学校外，很多侨校在上中文课时，因学生发

音不同,按籍分班,分别用不同的方言授课。^[15]当时的学者李长传认为,针对这样的情况,“先国语逐渐推行,地域观念,当可日渐消减也。”^[16]

教育界人士也有较为一致的看法,认为应该破除省界藩篱,统一使用国语。1917年,近代教育家陈宝泉就曾针对南洋部分学校仍然使用方言教学的现象指出,海外华侨虽被称作“同胞”,但由于发音各异,不通过中间人翻译都不能了解彼此的想法,简直是笑话。他建议广大华侨响应国内教育部提倡统一国语的号召,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17]

中国近现代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也意识到海外华侨普遍存在着狭隘的地域和家乡观念,他认为,要想破除这个壁垒就需要首先统一国语。他对比了荷属与英属南洋侨校的国语教学,发现“荷属华侨犹是闽粤人,而何以无闽粤语之为碍;固由当局热心提倡国语,亦以其每埠一会馆,每会馆一学校,聚不同籍儿童于一堂,势非一种方言所能达意,以是知英属国语程度之所以较差,实分籍招生有以致之”。^[18]黄炎培还提出三条应对措施:一是在招收学生的时候不按籍贯分班;二是聘请老师时不限制非本籍贯的,如果是本籍贯的也必须会讲国语;三是在学校里必须讲国语,严禁讲方言。这些名人、学者的言论承袭了清代以来对于民族共同语教学的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体的办法和行动方案。

(二) 政府的海外语言政策及其反响

1. 政府颁布的海外语言政策

民国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不推行民族共同语,会阻碍海外华侨之间的交流,使得他们很难对国家产生认同感。国语的传播有助于海外华侨从整体上认同中国,而非单纯地认同于自己的家乡。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侨生回国深造,语言交流的问题日益突出,不懂国语只会说方言的侨生面临不小的困难。回国升学的华侨学生讲国语会更加方便,既克服了语言障碍,也有利于学成返回海外后保持和发扬中华文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反响。国语运动的主要成就包括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建立国语的基本标准,并尝试了汉字的简化。1920年,教育部规定初小“语文”科改为“国语”科。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公布《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规定小学、初中、高中的语文科一律定名为“国语”科,小学课本取材以儿童文学为主。1935年5月,“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就是普及国语。其《组织规程》第一条便规定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八项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视察并辅导各学校国语科之教学。”^[19]由于当时的海外华文教育属于国民教育,因此也须遵照上述政策执行。

此外,侨务部门还制订了专门政策。侨务委员会于1932年12月26日颁布了关于海外侨校语言使用的政策——《侨民学校应一律改用国语教授令》。^[20]该政策通令使用国语进行教学,并鼓励举办国语演说会、国语辩论会等作为练习。明确了政策实施者是各驻外领事,并通过各地领事通知其辖区内的华侨学校来实施国语教学。有了具体的责任人,政策的推行更为顺利。同时,该政策也注意到海外华校的实际情形,特别提到,如果是外国语课程,要用该外国语讲解。至于政策实施的方法,不仅对仍用方言教授者“恳切劝止”,还提出通过举办“国语演说会”“国语辩论会”等活动来练习国语,扩大国语的传播和应用。

随后,在针对学校教育的规定中,又多次强调了“国语作为教学语言”的重要性。1933年行政院会议通过的《侨民教育实施纲要》第三条关于学校教育者规定中的庚款指出“各校以国语统一教授”。^[21]再一次提出了教学语言为国语的问题。1934年修订的《侨民中小学规程》中也明确提出,“侨民中小学,除外国语外,一律以国语为教授用语,小学不得采用文言教科书。”^[22]1936年,《华侨国语文补习班组织简章》颁布,规定补习班的办班宗旨是使华侨学生通晓国语文,补习班由当地在国内立案的侨民教育团体和侨民学校设立,当地使领馆负责监督,班容量不超过40人,对年龄、性别均无特殊要求,上课时间是晚上,每周不少于4小时学习时间。为达到普及国语的目的,该班只收

取低廉学费,如费用不够,相关部门予以经费上的支持。〔23〕

这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使得推行“国语”不仅有了明确的行动纲领,更有了具体的措施,对于海外华侨提高国语水平,增强认同意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说明,国民政府已经意识到国语在统一民族意识、加强海外华侨团结、形成民族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

2. 海外华文教育界积极响应

海外华文教育界也积极响应“国语”运动。一方面,华文教育机构共同商讨对策;另一方面,华文学校切实采取措施,逐步普及国语。

华文教育机构是在中国政府支持下,由海外华侨自发成立的,其目的是帮助和指导当地华文教育更好地发展。在国语推广运动中,华文教育机构的作用不可小觑。1917年7月,荷属华侨学务总会召开教育研究会,制定并通过了《南洋荷属华侨学校课程标准》,规定侨校初小和高小必须开设国文、国语课程;加强小学一年级国语课教学;国民学校一年级以上不用翻译上课;以《三国演义》文体为国民学校适用文体;等等。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得华侨学校国语教学水平有了明显提高。〔24〕

1926年,荷属华侨教育研究会规定,“华侨普及国语实为不可缓之要图”。〔25〕为了更好地推进国语教学,研究会建议从多方面着手营造国语环境:在侨校,使用国语唱片进行教学,提升学生对汉语的兴趣;教师不得用方言授课,一律使用国语。此外,研究会还发挥机构的作用,要求华文报纸增加用“语体文”写的稿件,以配合侨校学生学习、阅读。华文教育机构从思想上重视,并采取诸多措施,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侨学校形成良好的国语教学环境,还为提高华社的国语氛围起到了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学校以实际行动践行国语教学。例如,菲律宾的一些华校在夜校设立了国语专修科。1925年,还成立了专门推广国语运动的机构——“猛醒国语研究社”。〔26〕新式华侨学校上中文课时,改变了以往按不同籍贯分班、用不同方言讲授的弊端,统一用国语代替方言授课。从1929年开始,华侨学校在教学用语、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时数、教师选聘等方面均按照国民政府的政策要求来实行。

民国时期政府重视“国语”在海外华侨社会中的推行,对华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国语运动增强了海外华侨的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加深了海外华侨对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认同感,唤醒了华侨社会对于文化知识的渴求。海内外通力配合,双管齐下,收效良好。据20世纪30年代对英属和荷属南洋各地华侨识字人数的统计,识字人数占30%左右,许多土生华侨儿童和青年都会讲国语、识认汉字。这与华侨学校施行国语教学也是分不开的。〔27〕

三、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一) 语言改革与国家侨务政策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政府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其主要职责是在全国推行语言文字改革,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简化字成为汉字规范。同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普通话”^①作为民族共同语的地位。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为实现语言生活的现代化和信息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73年,汉语成为联合国工作语言。2000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言”地位。

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改革继续朝着规范化、标准化和现代化迈进。但在一段时间内,其影响并未

①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涉及海外。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为了避免东南亚国家的猜疑,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侨的权益,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尼政府签约取消“双重国籍”。随着“双重国籍”的取消,大部分华侨选择了外国国籍成为华人,华文教育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华人所办学校不再属于侨民教育,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对大部分海外华校的管辖权。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对海外的影响比较小。台湾当局实际控制了海外很多地区的华文教育,继续推行国语、繁体字和注音符号。

(二) 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对海外的影响

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是随着中国国际移民的迁移传播到海外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谋生,兴办华文教育。他们把新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成果也一同带到了住在国。使用简化字还是繁体字,汉语拼音还是注音符号曾一度造成海外华文教育界的困扰。以大陆移民较多的美国为例,繁简字的使用情况与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也与双方在美人口的多寡有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美台湾移民大大超过了大陆移民,美国的中文学校^①基本上都使用台湾课本、教繁体字、识注音符号。改革开放后,赴美大陆移民逐渐增多,大陆移民兴办的学校也越来越多。这时,中文学校的教师在对于字体的选择上就出现了变化。有的学校开始同时并行两种字体,在教材的选择上也更加多元化。^[28]

21 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汉语的国际地位明显提升,大陆移民人数持续增长。简化字逐步成为大多数中文学校的选择。就连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的中文能力考试 SAT 和美国大学理事会 2007 年开始的高中生预修大学课程的 AP 课程中文科考试,也不得不适应现实,采取了一字两体。

除美国以外,欧洲、东南亚、大洋洲、美洲、非洲等地区的华文教育也都基本上普及了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即使有的传统老华校仍然在使用台湾出版的教材,也会同时使用大陆的课本,让学生同时掌握汉语拼音和简化字。根据有关调查,目前,没有学习和使用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海外华校数量非常有限。教学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正在逐渐成为世界各地华文教学的主流。^[29]汉语“正逐渐跃升为在全球可能仅次于英语的新强势语言,汉语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30]可以说,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的使用领域和使用地区不断拓宽,语言声望不断提升。

这一时期,中国官方语言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华侨华人的人口迁移带来的。然而,影响华侨华人语言选择的决定因素,主要还是中国国家实力和语言声望的提升。面向未来,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用合作的思维对待华侨华人共同语的问题。百多年来,华侨华人不仅仅在华人社会内部传承民族共同语,更发挥了向住在国主流社会传播中华语言文化的桥梁作用。在全球化的当下,我们应该放眼全世界,更加关注华人社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认识到无论是“普通话”还是“国语”,差异并不大。全球华人如果能做到求大“同”存小“异”,应该可以在沟通中实现互鉴、互助和共赢,共同为中华民族优秀语言文化向世界的传播做出贡献。

由于历史背景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官方语言的演变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以及推动力量也不尽相同。晚清海外官话教育的推行刚刚开始,主要是依靠各方有影响力的人物来实现的。民国时期,海外国语教育的推动力量主要依靠政府发布专门的语言政策,以及华文教育机构和华侨学校积极配合。普通话、汉语拼音和简化字在海外华文学校中的普及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大陆国际移民迁移到世界各地而进行的。其深层动因是中国综合国力逐步增强,普通话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

民族共同语在海外华文教育中的推行,不仅消除了华侨华人之间的语言隔阂,有利于彼此的交流和沟通,更增进了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加深了华侨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认同感。经过百

① 美国的华文学校习惯上被称作“中文学校”,多为周末制形式。

余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官方语言形成、发展并逐步普及到海外。相信在全球化的当下,海外华文教育作为中国与住在国之间的文化桥梁,将会进一步把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成果带到全世界。

[注 释]

- [1] 别必亮:《近代华侨学校的国语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8年第3期。
- [2] 于锦恩、蒋媛、鹿牧:《国语教材〈新编南洋华侨高小国语读本〉简析》,《海外华文教育》2011年第3期;于锦恩:《民国时期华语教材的民族认同导向和当地化进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于锦恩、刘英丽:《民国时期华侨汉语教育政策简论——以东南亚华侨的汉语教学为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于锦恩:《民国时期华文教材语言资源的当地化》,《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于锦恩:《民国时期华文教育本土化探析——以国语文教材的编写为视角》,《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于锦恩、谷阳:《民国时期大陆学人所编东南亚华校国语教材的特点——以沈百英所编华校国语文教材为例》,《海外华文教育》2015年第2期;于锦恩:《民国时期东南亚人士编写的国语(华语)教材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4期;于锦恩:《民国时期华校国语文(华语文)教师的几个来源——以东南亚华校的国语文教师为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 [3] 李安山:《明清时期有关华侨华人典籍笔记和研究概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 [4] 颜清湟:《从历史的角度看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3期。
- [5]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第33页。
- [6] 李长傅:《华侨》,《常识丛书》(第二十八种),中华书局,1927年铅印本,第15页。
- [7] 梁德坤:《吧城中华会馆和暨南学堂》,《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 [8] [9] 刘伯骥:《美国华侨逸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第98页。
- [10]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85页。
- [11] [12] 别必亮:《近代华侨学校的国语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8年第3期。
- [13] [14]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第285页。
- [15] 别必亮、田正平:《近代华侨教育的历史考察》,《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 [16] 李长傅:《华侨》,中华书局《常识丛书》(第二十八种),1927年铅印本,第16页。
- [17] [18] 别必亮:《近代华侨学校的国语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8年第3期。
- [19] 黄晓蕾:《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 [20] 耿素丽、张军选编:《侨务法规汇编》,《民国华侨史料汇编(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309页。
- [21] [22] [23] 耿素丽、张军选编:《侨务法规汇编》,《民国华侨史料汇编(九)》,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第282、292、723页。
- [24] [25] [26] [27] 别必亮:《近代华侨学校的国语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1998年第3期。
- [28] 梁培炽:《美国华文教育论丛》,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 [29] 中国华文教育网:“繁简之争缠绕多年 简体教学领跑美国中文教育”,<http://www.hwjyw.com/info/news/200907/t20090727-30412.shtml>。
- [30] 陆俭明:《汉语走向世界的一些思考》,《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焕萍]